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社会主义 500年编年史

一下一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
组织编写

闫志民 王炳林 贺亚兰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社会主义 编年史

— 下 —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
组织编写

闫志民 王炳林 贺亚兰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主编简介



闫志民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炳林

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



贺亚兰

中共北京顺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原团长。

责任编辑：吕克农 刘 迪 马 群

责任校对：路晓箭

责任印制：武绽蕾

封面设计：吕彦秋

目 录

— 下 —

第五篇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1899—1977）	489
大事记	498
第六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1978—2016）	679
大事记	685
主要参考书目	903
后 记	911

第五篇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1899—1977)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农民阶级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良方。洋务派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器物文化之路走到了尽头。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中国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五四爱国运动又促发了整个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幕开启。

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入中国是19世纪末。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乃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

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逐步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从东、西、北3个方向传入中国。东面是日本。“五四”前后，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到日本留学，将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西面是欧洲。蔡和森、周恩来、李富春等到法国等欧洲国家，将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传入中国。北面是俄国。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

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中国的命运有了光明前景。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艰巨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

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正确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做了阐明。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曾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了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年底、1940年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

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做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以规定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10~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强；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地改革后党注意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纲领。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

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论述了10个问题,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大会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

践检验。当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大跃进”等严重失误。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10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

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一切职务。同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随后，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实现历史性转折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大事记

1899年

2月

2—5月 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中文《万国公报》，在第121~124号上连载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一书的重点，其中多处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功绩和学说，称赞马克思为著名“百工领袖”。这被学术界认为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中文名字。

1900年

8月

14日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1年

9月

7日 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日本、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一、赔款4.5亿万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做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白银9.8亿余万两，被称为“庚子赔款”；二、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驻守；三、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的炮台，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和北京至山海关沿线12个战略要地；四、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10月

15日 光绪皇帝御批，我国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第二所国立性质大学——山东大学堂成立，成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发祥重镇。其同时也是我国第一所按章程开办的大学。

1902 年

5 月

8 日 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山西大学堂。

7 月

12 日 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章程》，由清政府颁行，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些章程对辛丑年以后清政府设立的各级各类学堂的学制、入考方式、教学内容等，做出一系列规定，是中国近代学堂教育体系整体设计的最初方案。

是年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称“麦喀士”（即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1903 年

2 月

15 日 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 11 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并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这篇文章附录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评》《资本论》5 本书。

4 月

8 日 中国留日女学生胡彬夏等在日本发起成立第一个爱国妇女团体“共爱会”。

是日 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到期限，俄拒绝退兵反而增兵 800 多人重新占领营口。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新约。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京师大学堂“鸣钟上学”，声讨沙俄侵略，慷慨拒俄。

1904 年

2 月

8 日 日本偷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成为战场。

1904年4月、8月 1905年2月、7月、11月

3月

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东方杂志》创刊。《东方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第四十四卷（即停刊前最后一卷）又改为月刊。该刊设社说、内务、军事、外交、实业、教育、宗教、文件、记载、调查、附录、小说等栏目。该刊是一种文摘剪报性质的刊物，各栏刊出的文字多数是从当时国内外报刊上剪辑来的，只有很少部分是直接从作者那里组来或自己撰写的。该刊的记载专栏分中国大事记、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等门类，连续而详细地辑录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赞赏和推动实行宪政，是该刊的政治倾向。

8月

22日 邓小平在四川省广安县出生。

1905年

2月

陈独秀、常恒芳、柏文蔚等在安徽芜湖成立革命团体“岳王会”，举陈独秀为总会长。秋冬间在南京、安庆设立分会。

7月

30日 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出席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在日本的成员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田桐、吴春阳等，以及留日学生共计70多人。会议确定以“中国同盟会”为会名，通过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兆铭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

11月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该报设有社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目。《民报》的宗旨就是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化为常识而深入人心。在创刊号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第2期发表了蛰伸（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主要著作，还节译了《共产党